

国有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 来自跨国比较的经验证据

郎 昆 冯俊新

【摘 要】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在不同社会体制和发展阶段中都对经济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跨国历史比较视角检验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分析得出,在控制了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后,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随着一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其国有企业占比先逐步下降,并在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后趋于稳定,并呈上升趋势。同时,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对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国有企业占比越高对GDP增速的促进效果越明显。由此得出的相关启示是,对待国企发展,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模仿发达国家在发展成熟后的经验,更不能简单地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方案。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发展中国家

【作者简介】郎昆(1995-),男,山西大同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有经济、国际经济研究(北京 100084);冯俊新(1980-),男,广东鹤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研究》(长春),2021.5.70~8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16XNI003)。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是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然而无论是西方主流理论界的学术期刊文章,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政策报告,国有企业常常与“低效率”“要素错配”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僵化的负面形象,私有化也成为了西方学者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国企改革的主流方案。然而回顾各国的经济实践不难发现,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在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均普遍存在,尤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都曾发挥了关键作用。近年来,关于国有

企业私有化的后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主要西方国家,国企私有化进程已经中止,2008年金融危机后甚至有一些西方政党开始号召重建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很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经济体(前苏东国家、拉美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也大多未能实现经济效率提升和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基础设施不足等难题。如何弥合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的鸿沟,消除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固有偏见,从理论上讲清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跨国比较的视角来总结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通过对这一关系的梳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为我国在今后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国企作用提供指导。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含四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基础,是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道路。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国有企业”这个词,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思想表述很清楚,例如,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这样阐述,“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从事社会劳动。”^[1]周新成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必须坚持。^[2]黄速建和余菁认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家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府代表公众利益参与经济、干预经济、实现再分配的有效手段。^[3]张晨和张宇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存在不仅是解决市场失灵,更多是克服市场缺陷,即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非公正性。^[4]丁堡骏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最现实的实现形式。^[5]文一的研究在强调了市场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的同时,还强调在工业化的初期需要国家力量来帮助创造这一公共产品,亦即国有企业起到了创造和培育市场的作用。^[6]二是基于社会职能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当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时,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社会职能。白重恩等认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由于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国有企业同时承担了组织生产和提供社会福利的多重任务。^[7]三是基于经济制高点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府通过建立国有企业,优先发展战略性产业,从而实现赶超发展的目标。例如,耶金和斯坦尼斯罗(Yergin and Stanislaw)认为,私人 and 国外企业家没有能力、兴趣或远见来投资对国家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特别是在一国经济起飞的早期和产业转型升级期,需要国家的力量控制经济“制高点”。^[8]薛汉伟梳理了列宁对国有制观点的论述和形成过程,即政府需要控制经济中的“制高点”(如土地、大工业等),并吸收私人资本参与经济建设和竞争。^[9]四是基于市场失灵理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品提供方面,国有企

业可以修正自由市场竞争带来的扭曲。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提出,政府应“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10],1936年凯恩斯也提出公共事业应由政府投资并经营,“还有一类日趋重要的投资,由政府从事,由政府负担风险。从事此类投资时,政府只想到对于未来社会之好处,至于商业上利益如何,则在所不计。”^[11]萨缪尔森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并用模型论证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所以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生产并提供。^[12]谢地等的研究表明,如果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增,最优方式是由一个厂商来生产,但单一厂商的垄断也带来了定价悖论、效率悖论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国有企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13]

综合上述四类观点,可以将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为两个特征: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是指国有企业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并非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面临市场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基础设施缺口等问题,国有企业都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作用,这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特殊性是指国有企业的作用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的行业布局和功能定位也需要进行优化调整。围绕国有企业作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文在案例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后,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随着一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其国有企业占比先逐步下降,并在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后趋于稳定,并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阶段性,对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国有企业占比提高对GDP增速的促进效果越明显。本文研究表明,对国有企业作用的分析,应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不同来进行评价,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应立足本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来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国企改革方案,不能盲目追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二战后英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通过案例分析证实了国有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第三部分给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国企必要性的理论解释,并由此推导出国有企业占比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两个假说;第四和第五部分使用大样本跨国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第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启示进行总结。

二、案例分析

英国作为传统西方国家的代表,二战后国有企业的发展分别经历了国有化和私有化过程,本节将以二战后的英国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检验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并非特例,同时期,法国、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14]

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数据的细致梳理,我们整理了1950–2018年间英国国有企业在固定资本形成中占比的变化趋势(见图1),并将二战后英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51年,这一时期工党艾德礼(Attlee)政府上台后,为了快速恢复战后的经济,解决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推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密集性地将一大批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金融和能源类企业进行国有化,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到1951年国有企业占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比重已上升至17%,并遍布于银行、电力、电信、医疗、煤炭、煤气、航空、铁路、公路、内河航运、码头等多个行业。^①第二阶段是1952–1978年,这一时

期虽然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但国有企业资产在英国经济中的占比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到1978年撒切尔政府开始私有化改革前夕,英国的邮政、电信、电力、煤气、煤炭、铁路和船舶部门国有企业占比(按劳动力占比计算)达100%,在钢铁和航空部门达到75%,汽车制造和石油工业部门也分别达到50%和25%。^[13]第三阶段是1979–1989年,这一时期撒切尔夫人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机构臃肿、大面积亏损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包括电信、航天航空、公共交通、汽车、钢铁、煤炭、电力、供气供水、铁路等部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完成了私有化改革,国有企业占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比重也下降到了4%左右。^[15]第四阶段是1990年至今,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在英国并未完全消失,国有企业资产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特别是一大批社会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仍被保留了下来,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国民保健署(NHS)、林业委员会等。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英国国有企业贡献了全国固定资本形成的3%。^②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1952–1978年间,尽管英国国有企业资产比重一直维持在高位,且国有企业的组织方式和行业分布均无明显变化,但在前后两个阶段,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表现和企业经营状况两方面。

从宏观经济表现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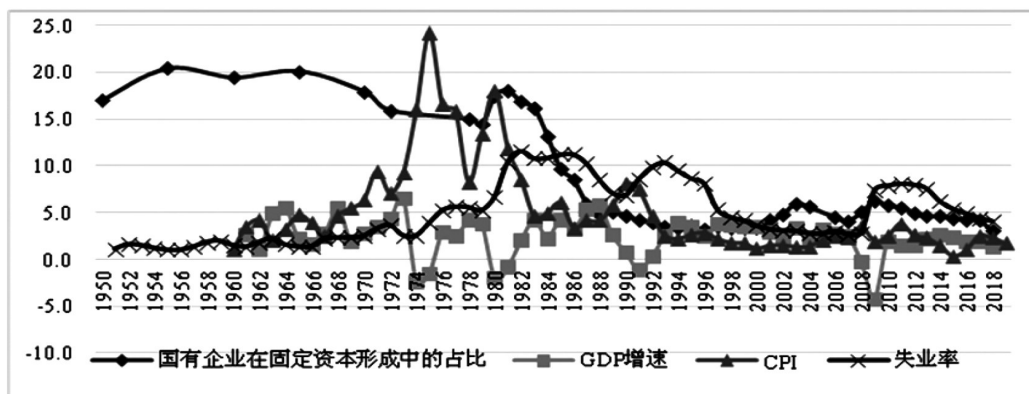


图1 1950–2018年英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单位:%)

数据来源:U. K.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1973); Shirley and McDonald(1995);^[15]Office for UK National Statistics(2019);^②世界银行WDI数据库;IMF数据库。

国有企业对改善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促进英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战后英国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英国GDP年平均增速超过了3%,失业率长期低于2%。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充实的社会福利制度导致社会保障负担增加,国民工作积极性下降。国有企业也因市场需求下降、自身机构臃肿、缺乏激励机制、承担过多社会责任等原因,竞争力不断下降,并出现了大面积亏损。这一时期失业率不断上升,物价大幅上涨,由于对经济停滞和社会问题的不满,各种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人们把当时英国社会的问题统称为“英国病(the British disease)”。

从企业经营状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德礼政府推动国有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建立垄断的国企将行业内原本分散的企业组织起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优势,提升行业竞争力。正如1945年工党在大选纲领中所说:“今天,我们与经济大国并存,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逐年飞跃。……英国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行业,使之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只有这样,英国才能保持其作为大国的地位。工党打算将英国的工匠、设计师和科学家的技能都联系起来,为我们的同胞服务。”^[16]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前,英国国有企业表现亮眼:据英国国家经济发展署(NEDO)1976年报告,60年代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生产率比其他部门增长快,1958-1968年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5.3%,高于同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3.5%。^[17]然而这种优势并未得到维持,进入20世纪70年代,除个别市场需求增长较快的国有企业(英国航空公司、煤气公司、通讯公司)运营状态良好外,大部分国有企业逐步陷入亏损,如英国钢铁公司、煤炭公司生产率的增长率分别为-2.4%、-1.3%,远低于同时期制造业年平均1.75%的增长率。^[17]与此同时,国家对企业的财政补贴逐年增多:1974-1975年英国煤矿、铁路和钢铁等国有企业需要国家补助6.09亿英镑,到了1984-1985年上升至40亿英镑。^[18]国企的大面积亏损给政府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才有了后来的撒切尔政府对国企的大规

模私有化。

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英国的案例表明,要辩证地和动态地认识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两者并非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关系,而是要分情况、分阶段进行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经济社会受到严重的破坏,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国有化可以集中资源和促进规模效应的发挥,国有企业能起到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没有及时对国企的组织形式和行业占比等进行适当调整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英国本身的经济特征和社会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通过对英国的案例回顾,我们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条件下,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明显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国有企业可以明显促进经济增长,在本部分我们尝试给出理论解释。

首先,经济发展初期投资缺口较大,国外部门和国内民营部门的资本投入不足,政府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可以有效促进投资。几乎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不是投资效率问题,而是投资资金来源问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能源、通讯等领域都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这些项目投资数额大,回收周期长,投资风险大。夸克(Quak)的研究发现,全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每年有1.4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其中超过一半的投资来自政府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每年公共投资需求的规模相当于GDP的27%。^[19]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早期,国内民营资本积累不足,国外资金则要求很高风险溢价,这就导致依靠市场的自发行为无法完全满足投资需求。这时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动员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相应领域,补齐投资缺口。

其次,经济发展初期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有限,国内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完善,因此不具备大范围推行产业政策的条件。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并非是国家干预经济、矫正市场失灵的最

优方式,一国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政策、反垄断立法、产业政策等方式均可以实现同样目标,且部分国家的成功经验似乎也验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例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被认为与其产业政策密切相关。^[20]然而,倡导上述干预方法的理论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大范围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政府应具有较强的财政汲取和再分配能力,而这一条件在绝大多数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中并不成立。例如,吕冰洋等研究发现,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远低于高收入国家(见表1)。^[2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低收入国家发展受限的原因: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投资缺口,另一方面政府无力通过税收和补贴等常规手段刺激市场主体进行大规模投资。如果不考虑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这种现实约束,就盲目要求其落实“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去监管化”原则,其结果必然导致其无法解决投资缺口、持续的经济低迷和无力承担的财政负担等问题。

再次,经济发展初期存在大量的“沉睡资源”,但由于各类要素市场尚不完善,通过市场方式难以实现有效配置,国有企业可以更有效地盘活资源。所有发展初期的国家都面临相似的困境:大量矿产资源无法得到开采利用,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被吸纳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究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生产要素的短缺,而是由于各类市场摩擦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经济仿佛陷入一种永久性的“大萧条”。这些摩擦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法制基础不完善、合同无法得到有效履行、产品质量难以监管、金融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产业链上下游协调机制不健全等。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不失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准

行政命令”的方式组织和配置资源,尽管会造成一定的资源错配,但可以迅速盘活“沉睡资源”;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往往是“企业办社会”,除了企业外还兼具了规划部门、社会服务、金融保险等机构的职能,尽管这种功能合并会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也降低了多部门的协调成本。

最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具有外部性的基础服务和基础研发等部门需要先行发展,国有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回顾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也不难发现,稳定的能源供应网络、便捷的交通通讯服务、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等,均是一国制造业腾飞的先行条件。各国的实践表明,把这些行业国有化可以极大促进新增投资,迅速弥补存量短板,帮助后发国家实现赶超。与此同时,很多行业在发展初期都需要一些基础性、公用性的技术,这些技术和经验的缺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国有企业通常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重点领域进行持续投入和尝试,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往往具有溢出效应,使得行业内很快出现一批中小型私企跟随效仿。以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私企的发展为例,“私企产品慢慢出现在(国企带头的)轮船制造、铁路交通和机械装备等领域中。与此同时,那些在国有企业和军火工厂中掌握了新技术的工程师和工人开始向私有企业中转或者开设他们自己的工厂。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商品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在东京和大阪开始出现小企业和转包商”。^[6]改革开放后中国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都体现了这种溢出效应: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离不开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乡镇企业在江苏南部和山东的胶东半岛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星期天工程师’现象: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星期天到附近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指

表1

2016年不同收入组别经济体的宏观税负比较

(单位:%)

经济体	小口径	中口径	大口径
低收入	16.11	20.07	25.78
下中等收入	17.12	18.13	25.62
上中等收入	19.91	20.57	32.11
高收入	26.69	28.50	42.13

数据来源:转自吕冰洋,詹静楠,李钊.中国税收负担:孰轻孰重? [J]. 经济学动态,2020(01):18-33.

导”。^[22]此外,在不少行业中,大国企还通过吸引一批中小型私企做配套,有效带动了行业的发展。

上述的理论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多种的作用机制,使得国有企业的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此外,国有企业的上述作用机制有很多跟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关,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早期上述作用机制通常更为强烈,因此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作用可能更为显著。为了检验上述假说是否成立,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可检验假说:

假说1. 国有企业经济比重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假说2. 对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国有企业经济比重提高对GDP增速的促进效果越明显。

尽管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较多研究讨论,也得到了现实诸多案例的佐证,但由于跨国历史数据难以获取,国有企业占比统计口径各异等原因,在传统的经济学文献中尚缺乏严谨的实证检验作为支持,本研究致力于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整理了1978-1991年一百多个国家或

地区的国有企业情况的历史数据,^[15]这是迄今笔者发现的唯一可用于大规模跨国比较的国有企业数据库。原数据库中包含了六个度量国有企业重要性的指标,我们分别计算了每个指标的数据缺失比例(见表2)。发现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和国有企业占外债比重两个指标数据缺失较少,考虑到指标的实际意义,我们最终选择了“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本文实证部分对国有企业占比的代理变量(除非特殊说明,后文提到的“国有企业占比”均指代“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为了解决数据缺失严重的问题,我们还参照鲁宾(Rubin)和舍费尔(Schafer)的做法,用贝叶斯线性回归法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23-24]最终将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指标缺失率下降至8.3%,包含了102个国家或地区的1355个样本点。

同时,我们参考世界银行的标准,^[15]根据1992年各国人均GDP水平将样本国家分为三组:低收入国家组(人均GDP小于等于67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组(人均GDP为676至8355美元)和高收入国家组(人均GDP高于8355美元),并计算了不同收入组别国家国有企业占比的平均数(见图2)。从1978-1991年的平均趋势来看,低收入国家的国有企业占比最高,中等

表2 世界银行国有企业占比数据库指标缺失比例

指标	国有企业占外债比重	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	国有企业占非农业经济比重
缺失比例	26.64%	38.55%	56.35%
指标	国有企业占经济活动比重	国有企业占内债比重	国有企业占就业比重
缺失比例	56.69%	63.15%	7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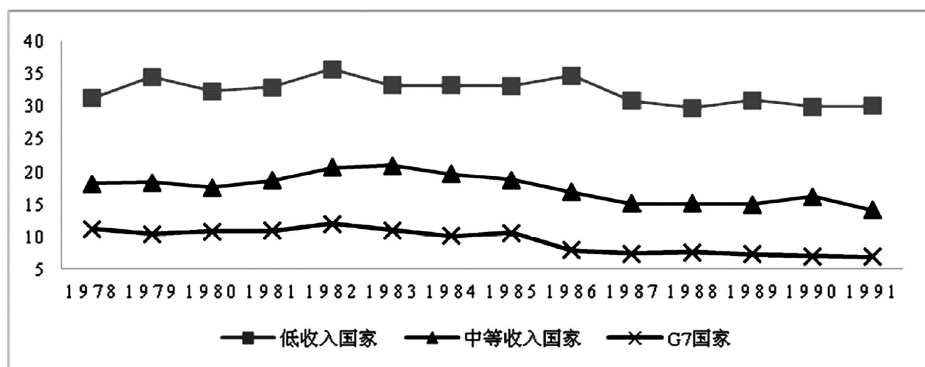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国家国有企业占比的均值(%)

数据来源: Shirley M M, McDonald L G. Bureaucrats in busines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5.

收入国家次之,高收入国家占比最低。

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1,即检验国有企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begin{aligned} \text{soe_share}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gdp_pc}_{i,t} + \beta_2 \text{gdp_pc}_{i,t}^2 + \\ & \beta_3 \text{soe_share}_{i,t-1} + \beta_4 \text{socialist}_{i,t} + \beta_5 \text{war}_{i,t} + \\ & \beta_6 \text{industry}_{i,t} + \beta_7 \text{invest}_{i,t} + \beta_8 \text{gov_exp}_{i,t} + \\ & \eta_i + \xi_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个体,下标*t*表示观测年份,soe_share_{*i,t*}表示国家*i*在第*t*年的国有企业占比。gdp_pc_{*i,t*}表示国家*i*在第*t*年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gdp_pc_{*i,t*}²表示实际人均GDP对数值的平方项。为了控制社会制度等因素对国有企业占比的影响,模型还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socialist_{*i,t*}代表社会主义国家;war_{*i,t*},代表战争;industry_{*i,t*},代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vest_{*i,t*},代表该国投资率;gov_exp_{*i,t*},代表政府消费占GDP比重。除此之外,本模型还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η_{*i*}和收入组别固定效应ξ_{*t*}。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2,即检验国有企业占比对GDP增速的影响,特别是检验这种影响是否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begin{aligned} \text{gdp_growth}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soe_share}_{i,t-1} + \beta_2 \text{soe_share}_{i,t-1} \times \\ & \text{gdp_pc}_{i,t-1} + \beta_3 \text{gdp_growth}_{i,t} + \\ & \beta_4 \text{gdp_pc}_{i,t-1} + \beta_5 \text{socialist}_{i,t-1} + \\ & \beta_6 \text{war}_{i,t-1} + \beta_7 \text{invest}_{i,t-1} + \eta_i + \xi_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个体,下标*t*表示观测年份;gdp_growth_{*i,t*}表示国家*i*在第*t*年的GDP增速;soe_share_{*i,t-1*}表示国家*i*在第*t*年的国有企业占比;soe_share_{*i,t-1*}×gdp_pc_{*i,t-1*}为国有企业占比和人均GDP对数值的交互项。前者回归系数反映了国有企业占比对GDP增速的影响,后者回归系数则反映了这种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变化。为了控制社会制度等因素对国有企业作用的影响,我们仿照模型(1)加入了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还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并对其他自变量都进行了一阶滞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如下:国有企业占比来自世界银行报告,^[15]是否发生战争数据来自UCDP武装冲突数据库,^③社会制度数据来自笔者整理,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④在数据处理方面,为了排除少数极端样本的影响,我们删除了核心变量前后各0.5%的尾部极端样本。计量分析中用到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有企业占国内投资比重,%	soe_share	1355	20.58	12.88	0.621	76.50
人均GDP的对数值	gdp_pc	1176	7.314	1.315	4.998	10.20
GDP增速,%	gdp_growth	1173	3.184	4.395	-12.31	15.17
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	socialist	1218	0.021	0.142	0	1
是否发生战争	war	1428	0.155	0.362	0	1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industry	949	26.55	9.861	9.489	57.94
投资占GDP比重,%	invest	1049	23.08	7.438	6.877	54.95
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gov_exp	1012	15.51	5.941	3.135	39.36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4。其中,第(1)~(3)列是只加入人均GDP一次项的回归结果,第(4)~(6)列是同时加入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加入二次项后,原有一次项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同时新增平方项

的回归系数也高度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两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二次函数模型可以实现更好的拟合效果。进一步把我们根据表4第(6)列回归结果画出的国有企业占比变化与人均GDP关系的示意图(见图3),可以发现:在控制了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后,国有企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

表4 国有企业占比与人均GDP的关系

解释变量	全样本						资本主义国家
	(1)	(2)	(3)	(4)	(5)	(6)	(7)
	soe_share _t	soe_share _t	soe_share _t	soe_share _t	soe_share _t	soe_share _t	soe_share _t
gdp_pc _t	-0.480 (-1.385)	-0.521 (-1.457)	-0.634 (-1.545)	-5.711* (-1.823)	-6.098* (-1.787)	-7.767** (-2.072)	-6.833* (-1.831)
gdp_pct _t ²				0.334* (1.760)	0.354* (1.728)	0.450** (2.003)	0.395* (1.767)
soe_share _{t-1}	0.824*** (27.30)	0.828*** (24.60)	0.832*** (23.90)	0.819*** (26.41)	0.824*** (24.08)	0.826*** (23.23)	0.836*** (23.23)
socialist _t	1.217 (0.571)	1.608 (0.733)	1.494 (0.674)	1.518 (0.713)	1.863 (0.854)	1.746 (0.794)	
war _t	-0.822 (-1.474)	-0.607 (-0.978)	-0.525 (-0.825)	-0.845 (-1.501)	-0.659 (-1.041)	-0.640 (-0.974)	-0.593 (-0.906)
industry _t	0.0817** (2.266)	0.0656 (1.247)	0.0682 (1.122)	0.0877** (2.421)	0.0815 (1.512)	0.0939 (1.487)	0.0803 (1.209)
invest _t		-0.0140 (-0.312)	-0.0196 (-0.425)		-0.0211 (-0.462)	-0.0284 (-0.604)	-0.0218 (-0.452)
gov_exp _t			0.0178 (0.340)			0.0115 (0.217)	0.00575 (0.106)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分组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5.654** (2.461)	5.772** (2.213)	6.332** (2.232)	24.30** (2.050)	25.70** (1.973)	31.97** (2.223)	28.61** (2.001)
观测值	856	757	698	856	757	698	673
Adj R ²	0.713	0.713	0.713	0.713	0.713	0.713	0.713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1%、5%与10%;括号中数值是t统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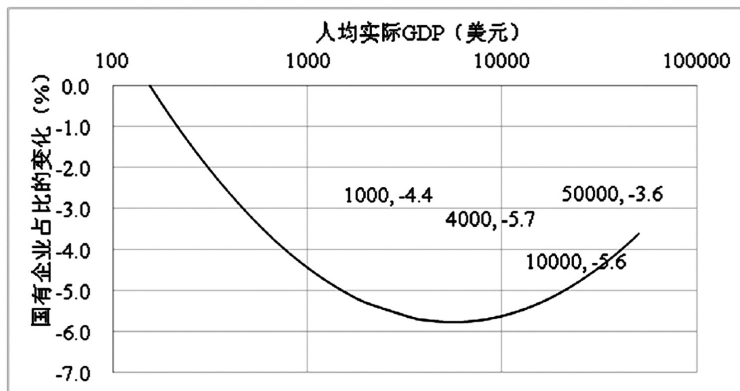


图3 国有企业占比变化与人均GDP的关系示意图

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随着一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其国有企业占比先逐步下降;当一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10年价格,下同)时,即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门槛后,其国有企业占比的下降速度会明显放缓;当一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时,即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后,该国的国有企业占比将基本趋于稳定,并呈上升趋势。该结果支持了假说1,证实了国有企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剔除了样本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数据,并在第(7)列展示了回归结果,发现结论依然成立。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第(1)~(2)列是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第(1)列未加交互项,第(2)列加入了国有企业占比和人均GDP对数值的交互项。结果发现,加入交互项后,原有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都有了明显提高,同时新增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在统计上显著,说明了加入交互项的模型可以实现更好的拟合效果。回归结果表

明:一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平均来说国有企业占比对GDP增速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这种正向效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逐渐减弱。根据第(2)列的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影响变量后,当人均实际GDP为224美元时(样本国家中的低收入国家在1978年的平均水平),国有企业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速将提高0.04个百分点;而当人均实际GDP达到约3000美元时,国有企业占比提高对GDP增速的促进作用基本下降为0。该结果支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2,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国有企业占比提高对GDP增速的正向促进作用较大。为了检验该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剔除了样本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数据,重新进行回归,第(3)~(4)列展示了回归结果,发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我们将样本国家分为两组:一组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组为高收入国家,分别进行回归。第(5)~(6)列是分组回归的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占比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GDP增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于高收

表5 国有企业占比对GDP增速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资本主义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1)	(2)	(3)	(4)	(5)	(6)
	gdp_growth_i	gdp_growth_i	gdp_growth_i	gdp_growth_i	gdp_growth_i	gdp_growth_i
soe_share_{i-1}	0.0181* (1.665)	0.125** (1.991)	0.0189* (1.722)	0.125** (1.988)	0.0241* (1.836)	0.00910 (0.416)
$soe_share_{i-1} \# gdp_pc_{i-1}$		-0.0156* (-1.769)		-0.0155* (-1.757)		
gdp_growth_{i-1}	0.318*** (7.234)	0.316*** (7.142)	0.305*** (6.779)	0.303*** (6.695)	0.251*** (4.319)	0.441*** (6.479)
gdp_pc_{i-1}	-0.766*** (-4.675)	-0.555*** (-2.777)	-0.763*** (-4.636)	-0.552*** (-2.752)	-1.151*** (-3.391)	-0.593*** (-2.879)
$socialist_{i-1}$	1.345 (1.268)	1.382 (1.303)			1.523 (1.449)	
war_{i-1}	0.389 (1.242)	0.374 (1.197)	0.385 (1.231)	0.371 (1.187)	0.675 (1.589)	-0.198 (-0.463)
$invest_{i-1}$	0.0285 (0.982)	0.0299 (1.029)	0.0296 (0.991)	0.0309 (1.032)	0.0282 (0.791)	0.00860 (0.203)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分组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5.427*** (4.779)	3.732** (2.501)	5.324*** (4.619)	3.635** (2.406)	7.159*** (3.551)	7.334*** (3.687)
观测值	916	916	891	891	511	405
Adj R ²	0.175	0.175	0.175	0.175	0.115	0.281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1%、5%与10%;括号中是t统计量。

入国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再次验证了假说2。

计量回归的结果验证了我们在案例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分析,有效地解释了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以及导致这种特征的作用机制。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控制了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后,随着一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其国有企业占比先逐步下降,并在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后趋于稳定,并呈上升趋势。同时,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阶段性,对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言,国有企业占比提高对GDP增速的促进效果越明显。

结合案例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第一,受制于数据限制本文无法对国有企业占比进行更为细致的行业分类,但根据前面的理论和案例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在一国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后国有企业占比趋于稳定,但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将会发生优化调整。对于这一作用机制的深入分析,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第二,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体制下的经济体,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组织形式和行业布局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其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复杂程度远超过计量回归的结果。因此各国在制定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时,应充分立足本国实际国情,探索最有利于本国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改革方案。

六、结语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是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虽然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社会体制和发展阶段中都对经济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国有企业却在西方主流学界受到多种质疑。如何消除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偏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理论上讲清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国有企业作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文在案例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

形式,在各国历史上和今天都普遍存在,并非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同时,在控制了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后,国有企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关系,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经济占比、发挥作用和行业布局也要动态调整。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对较低的国家,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结论为全面认识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根据本文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第一,要客观评价国企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作用。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不应该以发达国家在发展成熟后的经验来指导其改革,而是要认识到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早期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要加大国有企业在上游基础性行业的投资,有效调动国内的“沉睡资源”,弥补本国在重点领域的投资短板。与此同时,也应发挥好国企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吸引中小企业做配套、提供技术外溢、推广管理经验、培育和规范市场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二,要认真研究国企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优化调整。国有企业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手段之一,并可以跟政府干预经济的其他手段结合使用来提高其作用效率。要结合本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不断调整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行业布局,优化国有企业参与经济的方式,使国有企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第三,在借鉴各国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经验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不同体制下国有企业存在的意义、服务的对象都有明显差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作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需批判借鉴各国发展有益经验,使国有企业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盲目仿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更不能简单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

注释:

①UK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M]. London: H. M. S. O., 1961 and 1973 Editions.

② UK National Statistics. UK Economic Accounts Time Series[EB/OL]. (2020-12-22)[2021-03-10]. <https://www.ons.gov.uk/economy/grossdomesticproductgdp/datasets/unitedkingdom-economicaccounts>.

③ UCDP 武装冲突数据库[EB/OL].(2020-03-10)[2021-03-10].<https://ucdp.uu.se/downloads/index.html#armedconflict>.

④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EB/OL].(2020-03-10)[2021-03-10].<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4-67.

[2]周新成.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兼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0(4):29-34.

[3]黄速建,余菁.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06(2):68-76.

[4]张晨,张宇.“市场失灵”不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兼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5):38-45.

[5]丁堡骏.国有企业如何实现浴火重生[J].北京:红旗文稿,2014(20):19-21.

[6]文一.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J].北京:政治经济学季刊,2018,1(2):1-43.

[7]Bai C E, Li D D, Tao Z, et al. A Multitask Theory of State Enterprise Reform[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4): 716-738.

[8]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M].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3-15.

[9]薛汉伟.控制制高点——三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有制理论与现实[J].济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4):19-26.

[10]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87.

[11]凯恩斯,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8-139.

[12]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87-389.

[13]谢地等.论自然垄断与国有经济的关系——国际比较及中国视角[J].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3(1):37-43.

[14]郎昆,冯俊新.德国、法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J].武汉:法国研究,2020(4):85-95.

[15]Shirley M M, McDonald L G. Bureaucrats in Busines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5: 1-366.

[16]The Labour Party. Let Us Face the Future: A Declaration of Labour Policy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ion[EB/OL]. (1945-04)[2021-03-10]. <http://www.labour-party.org.uk/manifestos/1945/1945-labour-manifesto.shtml>.

[17]赵雪梅.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探析[J].武汉:经济评论,1999(4):115-119.

[18]杨卫东.国有化与私有化研究——西方国企进退的历史轨迹[J].武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00-105.

[19]Quak E. The Public Investment Gap: The Need for External Finance to Increase Public Investment[R]. Brighton, UK: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8: 8-9.

[20]祁京梅.日本产业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EB/OL].(2017-12-21)[2021-03-10].<http://www.sic.gov.cn/News/456/8697.htm>.

[21]吕冰洋等.中国税收负担:孰轻孰重? [J].北京:经济动态,2020(1):18-33.

[22]李锦,曹煦.走向市场——我亲历的国企改革过程[J].北京:中国经济周刊,2018(48):78-79.

[23]Rubin D B. Multiple Imput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Surveys[M]. John Wiley & Sons, 2004.

[24]Schafer J L. Analysis of Incomplete Multivariate Data [M]. CRC Press, 1997.